

## 参考书目:

- [1]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2]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4]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5]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6]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  
[7]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8]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  
[9]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0]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1]慕唯仁,“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弱国联盟”,《读书》,2003年,第12期。  
[12][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14][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译,《转变的中国》,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 【论 文】

# 家庭的民族特征与藏族大学生的高中学业成就<sup>1</sup>

陈彬莉、陈 进<sup>2</sup>

**摘要:** 学业成就对少数民族学生参与祖国现代化事业与拓展个人发展机会有着重要影响,也是21世纪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关注重点之一。关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学业成就差异通常存在“文化差异”与“结构性因素”两种解释路径,本研究对西藏4所本科院校1288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来自于藏族家庭的孩子的高考成绩明显低于来自汉族家庭的孩子;相比社会阶层、城乡等结构性因素,家庭的民族身份与藏族大学生高考分数之间有显著关联。家庭民族身份反映了学生家庭的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通过显性(比如,汉藏语言能力)和隐性(比如,对现代学校教育的认知)等多种路径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因此今后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和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关注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形势下,通过加强藏族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来提高他们数理化学科的成绩,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和拓展他们的就业空间。

**关键词:** 民族文化特征; 学业成就;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我国西部地

<sup>1</sup>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第34-41页。

<sup>2</sup> 陈彬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陈进,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区的人才和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质和量的双重变化,不仅在不断升级扩容,大规模人才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西部地区原来的就业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以我国藏族地区为例,一方面有部分藏族人口向东部城镇迁移,如2010年普查时生活在西藏自治区地方之外的藏族人口有54万,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8.6%<sup>1</sup>,这些藏族人口在藏区之外找到了就业空间;另一方面,2010年有28.6万非藏族人口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占西藏总人口的9.5%。<sup>2</sup>族群人口跨省区流动的规模在新疆、内蒙古等地更为可观。如此规模的各族人口跨越省区边境的劳动力迁移,正在逐渐改变我国传统的民族居住格局和语言学习模式。在西部城镇的社区、企业与服务行业中,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正在逐步成为最主要的工具性语言,因此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的汉语能力以及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双语能力和学业成就将直接关系他们今后能否进入高等院校深造和人生发展机会。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这些学生毕业后就业的选择范围就越宽,相应的发展机会及拓展的空间也就越大。研究表明,对于每个少数民族成员来说,自身教育程度的提升与知识结构的扩展有助于缩小其与主体民族成员在社会职业结构中地位与实际收入的差距<sup>3</sup>。从更宏观的民族平等的角度考虑,一个民族的成员中拥有高学历者在全体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越大,这个民族在主流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就越大,当各民族在劳动力职业分层结构中趋于一致时,民族平等才能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sup>4</sup>。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历史上的发展差距、传统经济模式的差异、基础设施及学校教育条件的差异、教学使用语言与教材质量的差异等),我国有些少数民族的学生与主体民族学生相比在学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sup>5</sup>。

为了补偿少数民族学生在接受现代教育过程中由于语言差异、教材质量和本地学校教育质量<sup>6</sup>所造成的就业竞争劣势,逐步缩小他们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差距,增强我国少数民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从建国初到现在,我国政府逐步建构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和各种倾斜性政策来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就。

在这些综合性、体系化的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学生目前的学业发展状况如何?各类课程的学习成绩是否仍与汉族学生存在明显的差异?学业成就的差异是否依旧与其民族背景相关?这是本文所关心的核心问题。高考分数是个体基础教育阶段学习质量和成就的集中体现<sup>7</sup>,也是目前高等学校录取的最核心依据。以母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高考中使用少数民族文字考卷的少数民族考生(“民考民”),特别是“理科”考生,在学习时使用的教材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考试成绩。而那些在中小学期间转用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汉语考卷的少数民族学生(“民考汉”),他们并转用非母语的汉文课本学习各门课程必然面临很大难度,付出的辛苦和努力使可想而知的。正是由于考虑到以上因素,我国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高考录取时对这些少数民族学生采用了程度不同的优惠政策。

<sup>1</sup> 马戎,2014,《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121页。

<sup>2</sup>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和国家民委经济司编,2014,《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上),北京:民族出版社,第5-6页。

<sup>3</sup> Campos, B.C., Ren, Y. et al.,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Vol (41): 253-267.

<sup>4</sup> 马戎:《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sup>5</sup> 教学使用语言与教材质量对于学生在自然学科(数理化等)的学习成绩密切相关。母语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满族、回族学生的学业成绩与汉族学生大致相近,虽用母语教学但教材质量较高的朝鲜族学生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汉族学生(马戎,2013,《民族社会学》北大出版社(第二次印刷),第663页。

<sup>6</sup> 由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藏区)的现代学校教育起步较晚,编写的数理化专业教材的质量有待提高,任课教师的学历和教学经验有待较强,这些地区中小学数理化课程的教学质量明显不如内地学校。

<sup>7</sup> 我国高考的科目对于“文科”考生为:中文、英文、数学(各150分)、历史、地理、政治(各100分);“理科”考生为:中文、英文、数学(各150分)、物理、化学、生物(各100分)。



本文主题并不是聚焦高考成绩的具体分科差异，而是探讨少数民族学生的整体高考成绩及其与汉族学生的差异，并努力探讨这一差距背后的影响因素。

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劣势的解释，在社会学界主要存在“文化差异”与“结构性因素”两种主要路径。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侧重“文化差异”的视角。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关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欧美人类学研究就关注到少数民族裔的学业发展上的劣势，提出文化剥夺、文化冲突和文化中断理论等。这些理论分别从黑人和白人所处社区文化环境的差异、少数民族学生在家庭和社区中所习得的语言、文化与正规学校教育既定系统之间的差别、不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价值冲突等多个方面来解释少数民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的原因。<sup>1</sup>之后，教育人类学家约翰·奥格布又提出了文化生态理论，试图从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社会地位、生存策略、以及族群关系等多重角度来解释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少数民族的群体成员如何看待既有的文化差异以及其对于教育的态度。<sup>2</sup>西方与中国人类学家对我国单个民族或者将具有共同地域特征和发展水平的若干民族的学生学业成绩的个案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特点（状况）。<sup>3</sup>

然而，在现有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研究的大样本量化分析（研究）中，“文化差异”因素的作用却不明显，研究者通常更聚焦于结构性因素（例如社会阶层、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等）影响的分析。大量研究指出，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教育获得之中的差异可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地域、城乡和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因为少数民族居住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西南、西北）及农村的比例更高，家庭社会经济水平更低，这些“非民族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其教育获得。例如韩怡梅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教育获得之中的差异可以部分归因于地理位置和贫困。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以后，民族间的入学差距大大缩小，仅仅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就解释了民族入学率差异中的三分之一，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地理特征两个因素共同解释了 50% 以上的民族差异。除了大的地理区域划分以外，城乡差异也是区域差异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农村孩子的教育获得远低于城市儿童。对于聚居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大部分人居住在农村地区，故其与汉族相比的教育获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城乡差异。洪岩璧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所产生的影响。两项基于中国西部省区的研究均发现，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地理特征这两个因素至少可以解释这些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学业成就或升学差异的 50%。在这类研究中，与民族特点相关的“文化变量”解释力则相对有限。比如在洪岩璧的研究中，民族身份变量在“基础教育阶段入学机会的获得”中并不显著，家庭常用语言的影响虽然显著，但其解释力远低于上述结构性因素。然而，许多现存的这类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将不同的少数民族汇总进行处理，即把 55 个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忽略各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在中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中，既有教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朝鲜族和满族，又有远低于全国水平的多个民族。不同民族间的语言、价值观、教育经验以及对现代学校教育所采取的主观态度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研究者有必要对中国国内的不同民族进

<sup>1</sup> 滕星、杨红：《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山区拉祜族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祖力亚提·司马义：《少数民族教育与教育的成功——新疆大学双语教育体系的个案研究》，转引自马戎、郭志刚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84-128页。

<sup>2</sup> 袁同凯：《教育人类学简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8-102页；巴战龙：《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研究的根本论题和基本视角》，《全球教育展望》2018年第1期。

<sup>3</sup> 郝瑞（Steven Harrell）：2000，《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滕星、杨红：《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山区拉祜族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袁同凯：《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罗吉华：《教育人类学视野下傣族和尚生低学业成就归因分析——以西双版纳州勐达镇中学为个案》，《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行分类研究。

本研究以西藏 4 所本科院校 1288 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关注的是一个文化同质性相对较高的群体，即单一的藏族学生。通过比较藏族和汉族大学生的高考分数差异，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两个群体的学业成就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藏汉之间的文化差异？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家庭所属社会阶层的影响？在我国少数民族当中，藏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受教育程度整体相对较低。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藏族文盲率为 30.5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0%；6 岁以上人口获大学本科及专科教育比例为 5.38%，全国平均水平为 9.19%<sup>1</sup>。本研究以这两个民族为单位，将藏族和汉族学生的高考分数进行对比，分析藏族和汉族学生的学业成就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相关分析将有利于丰富和细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图景，帮助我们更好了解低于全国平均教育水平的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进而为今后致力于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

## 二、研究方法

###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 2017 年西藏大学学生处《大学生生涯实践与就业创业指导》课题获得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西藏自治区 2017 届毕业生。该课题在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农牧学院和藏医学院这 4 所大学一共发放 1800 份问卷，具体抽样的方式为整群抽样，第一步先在每所学校抽取若干个系或学院，第二步在这些院系中再整群抽取若干个毕业班。实际回收 1435 份问卷，回收率为 79.7%。本研究主要使用了该问卷中的本人情况和家庭情况两个部分的相关数据。在剔除结果变量和解释变量缺失的样本 (N=147) 后，最终的分析样本包括 1288 名西藏在校大学生。

### 2. 变量、模型选择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西藏大学生的民族身份与其高考分数之间的关联。模型中的因变量为学生原始的高考分数，分文、理科考生分别进行回归，自变量分别为学生家庭的民族身份、学生的汉语能力，控制变量为学生性别、家庭所在地、父亲受教育年限和职业<sup>2</sup>。

除了极个别的族际通婚家庭外，学生本人的民族身份与其父母民族身份高度相关，因此本研究选用“家庭民族身份”这一变量来综合呈现学生及家庭的民族特点，分为两大类：（1）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如门巴族），（2）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汉族。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意味着家庭生活中日常使用语言为藏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家庭生活的组织和运行具有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在父母至少一方不是藏族的情况下，意味着家庭日常生活使用语言至少部分为汉语，那么该家庭的子女在家庭生活中应该是受到汉语环境的影响，在家庭生活中汉族的文化元素有可能多一些。基于文化差异理论，本研究提出假设 1：与家庭民族特征为藏族的学生相比，汉族家庭的学生高考分数相对较高。

与主流民族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有独立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从小生活在民族语言体系之中，进入以汉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教育后，其汉语水平有可能低于汉族，不利于其在学校的学习，进而有可能影响其高考分数。即学生的汉语水平有可能是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大学里将汉语水平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分班的重要依据，各大学通常将汉语水平较高的藏族学生分在汉藏混合班，而将汉语水平较低的藏族学生分在纯藏族班。因此，本研究通过学生在大学期间所处班级的学生民族构成来间接测量该学生的汉语能力，具体

<sup>1</sup> 马戎，2013，《民族社会学》北大出版社（第二次印刷），第 663 页。

<sup>2</sup> 由于父母的教育程度与父母的职业之间呈高度相关，而且父亲的教育和职业能够代表一个家庭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本文选用父亲受教育年限和父亲的职业来呈现家庭的社会地位。



分为两组：(1) 藏族学生为主（汉族学生少于 5 人）班级，(2) 汉藏混合班。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提出假设 2：与汉语水平较低的藏族学生相比，汉语水平高的藏族学生高考分数越高。

### 三、 研究发现与分析

#### 1. 样本基本情况

调查样本中的女性学生比例略高于男性，为 53.3%。少数民族学生占 55.4%，汉族学生为 43.6%（参见表 1）。在少数民族学生中，藏族学生占比为 99%，其他为门巴或珞巴族学生。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如门巴族）者在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55.1%，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汉族者所占比例为 44.9%。从中可以看出，西藏大学生中有一半以上出生于少数民族家庭，另一半来自汉藏通婚家庭或汉族家庭。

来自西藏自治区内和自治区外的考生在样本中各占约二分之一，其中区内农牧区学生比例为 31.2%，区内城镇学生比例为 19.7%。来自西藏自治区外的学生当中，农村学生比例为 36.7%，区外城镇学生比例为 12.4%。被调查学生父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9 年。在学生父亲的职业结构中，52.9% 为农牧业人员；服务业和制造业普通员工的比例为 14.1%；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为 15.8%。有 69.0% 的学生在大学中处于汉藏混合班级，而 31.0% 的学生处于以藏族学生为主的班级。

表 1、样本中学生个体及家庭特征描述 (N=1288)

变量名称	特征分组	频数(%)或均值(标准差)	变量名称	特征分组	频数(%)或均值(标准差)
学生性别	男	601 (46.7%)	父亲职业	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204 (15.8%)
	女	687 (53.3%)		服务业或制造业普通员工	182 (14.1%)
学生本人族群身份	藏族或其他民族	727 (56.4%)		个体户	139 (10.8%)
	汉族	561 (43.6%)		农牧业	681 (52.9%)
父母族群	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	710 (55.1%)		其他	82 (6.4%)
	父母一方为少数民族	578 (44.9%)	父亲受教育年数(年)		7.9 (4.1)
大学所在班级族群构成	汉族和藏族混班	889 (69.0%)	家庭所在地	区内农牧区	402 (31.2%)
	以藏族为主(汉族学生少于 5 人)	399 (31.0%)		区内城镇	254 (19.7%)
				区外农村	472 (36.7%)
				区外城镇	160 (12.4%)

调查样本中依据大学生主要个人与家庭特征分组的高考分数均值见表 2。男生成绩高于女生，出生在父母有汉族成员家庭的学生高考成绩高于藏族家庭学生，这一结果在预料之中。但是父亲是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的学生平均成绩反而比不上父母为服务业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学生，其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说明。从家庭所在地而言，城镇学生成绩高于农牧区，区外学生高于区内学生，这反映出区内学校的教学质量仍需要进一步提高。汉藏混合编班学生的高考成绩高于藏族班学生，这反映出来的实际仍是中小学阶段藏文教材和课程教学质量等方面问题。

在所调查样本的 1288 名学生中，文科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378.7 分，理科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361.8 分（表 2）。数据的标准差较大，即表示分数的分布离散程度较高。藏族文科大学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312.8 分，而汉族文科大学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454.4 分，二者相差 141.6 分；藏族理科



大学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293.2 分，而汉族理科大学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457.2 分，二者相差 164 分（见表 2）。理科成绩的族别差异远远大于文科成绩，这说明藏族学生在数理化等理科科目的学习成绩特别需要关注。

表 2、西藏大学生高考分数平均值（N=1288）

变量名	特征分组	高考分数均值(标准差)	
		文科	理科
	所有学生	378.7 (102.0)	361.8 (104.7)
性别	男	390.4 (99.2)	380.6 (103.7)
	女	370.2 (103.3)	343.5 (102.6)
民族	藏族或其他民族	312.8 (64.2)	293.2 (66.2)
	汉族	454.4 (83.1)	457.2 (66.9)
家庭民族特征	父母一方或双方为汉族	454.6 (83.2)	456.9 (68.4)
	父母均为藏族	308.6 (58.1)	289.9 (60.9)
父亲职业	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403.7 (98.8)	391.0 (103.3)
	服务业或制造业普通员工	419.6 (102.5)	404.5 (100.1)
	个体户	442.1 (95.6)	430.4 (90.8)
	农牧业	338.1 (88.6)	325.9 (94.6)
	其他	389.5 (91.9)	413.1 (95.7)
家庭所在地	区内农牧区	306.7 (57.6)	289.8 (65.0)
	区内城镇	356.0 (88.2)	348.9 (94.4)
	区外农村	415.9 (102.8)	402.8 (103.8)
	区外城镇	460.5 (83.3)	459.5 (68.9)
大学班级 民族构成	以藏族为主的班级	301.6 (49.4)	289.6 (69.6)
	汉、藏混合编班	416.9 (99.7)	392.3 (102.1)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

## 2.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高考分数的“净影响”不大。

在文科学生中，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均与子女的高考分数无直接关系（模型 3）；在理科学生中，父亲的教育程度与子女的高考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41），而与父亲职业则无直接关联（模型 6，参见表 2）。这说明与其他研究者将多个少数民族汇总取样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在西藏大学生这一群体中，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与其学业成就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阶层通过家庭的民族特征来对高考分数产生影响，在本研究中，当在多元回归分析单独加入阶层变量时，阶层因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当在阶层变量基础上加入家庭民族特征这一变量时，阶层变量基本不再显著。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基础教育事业的大力扶持与多项优惠政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由于学生家庭贫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 1951 年以来，西藏的现代教育历经了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过程。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中央政府全力扶持和地方政府积极努力的结果。从 1985 年开始实行“三包”（包吃、包穿、包住）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历经多次调整，覆盖面和资助金额不断扩大。政府的经济扶持大大推动了西藏基础教育的普及进程。2007 年，西藏自治区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2 年实行十五年免费教育。截止 2011 年，西藏自治区的小学入学率达到 99.4%，初中入学率达到 98.5%，高中入学率达 63.4%<sup>1</sup>。与此同时，为了利用内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少数民族人才，1985 年开始在内地 19 省市开办三所西藏中学和十六个西藏初中班，全部从西藏招收藏族等当地世居

<sup>1</sup> 韩晓悟：《西藏教育十年变化》，《西藏教育》，2012 年第 12 期。



少数民族学生入校学习,实行“四包”(即包吃、包穿、包住、包学习费用)。<sup>1</sup> 尽管中央政府对于西藏教育的(大力)扶持政策覆盖所有群体,但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影响更大,有可能补偿了家庭贫困给学生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在数据分析的结果中体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高考分数的影响不显著。

### 3. 西藏自治区内高考成绩城乡差距不明显,区内外理科生高考分数差异显著。

在调查样本中,有一半左右被调查的大学生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分析表明,来自西藏自治区内部的学生中,城乡背景差异对学生的高考分数影响不显著,但西藏自治区内的学生高考分数显著低于区外学生。与区内农牧区生源比,区外农牧区生源的高考分数要高 16.7 分,区外城镇生源高 21.7 分(见模型 3 和模型 6)。

西藏自治区内藏族学生成绩中的城乡差异不显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 50 年代之前西藏无论城乡都没有建立现代学校,解放后在建立现代学校教育方面城乡几乎同时起步,二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基础教育方面的大力扶持对于城镇学校和乡村学校基本同步,因此城乡学生的学习成绩差距不大。而区内外差异源于西藏本地学校的师资条件、语言环境、教学质量与其他 4 省(四川、甘肃、青海、云南)藏区学校的教学质量存在一定差距,这一差距是在民国时期形成的,民国时期的青海省、甘肃省、西康省、云南省政府曾一度努力发展藏区学校教育,因此 4 省藏区的藏族学生在报考西藏自治区各大学时,在考分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当我们以区外的汉族学生作为参照对象时会发现,无论是西藏自治区内的藏族还是汉族学生,在将来的竞争中均有可能处于劣势地位,而藏族学生的处境更为不利。今后西藏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如想改变这一基本态势,必须下大力气全面提高西藏各级学校的师资队伍和教学水平。

### 4. 学生及其家庭的民族特征是西藏大学生高考分数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在被调查学生中,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考生其高考分数比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面为汉族者低 160 分,即使在文科学生中,其差距仍为 151.4 分。在控制阶层、区域等因素后,在文科学生中,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考生其高考分数比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面为汉族者低 128.7 分,在理科考生中,上述两个群体相差 134.79 分。可见这一变量影响力度之大。从模型 1 到模型 3 以及模型 4 到模型 6 的调整 R 方的微小变化,可以得知家庭的民族特征是西藏大学生高考分数差异的最主要解释变量。

与以往的量化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教育成就差异的结构解释不同,本研究发现,社会阶层(表现在父亲职业方面)、城乡差异等结构性因素不能完全解释藏族和汉族学生高考成绩之间的差异,民族之间的“文化特征差异”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解释机制。在对于文化差异的具体比较中,既包括显性的文化差异,比如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学习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又包括了隐性的差异,比如一个少数民族基于自身的群体经验对现代学校教育所采取的主观态度和对学校学业成绩的重视程度等。

西藏自治区作为以藏族为主要人口的民族聚居区,父母的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是因家庭环境所获得的与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本文认为,由于 50 年代之前西藏一直没有建立起现代学校教育,民主改革后建立的学校在师资队伍、数理化教材建设、教学经验等许多方面处在努力追赶的阶段,这无疑对西藏的藏族考生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上的高考成绩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方面的影响客观地表现在汉藏学生高考学业成绩的差距上。

<sup>1</sup> 马戎:《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6 年第 2 期。



表 3、 西藏大学生高考分数多元回归结果 ( N=1288)

		文科 (N=473)			理科 (N=815)		
		模型 1 系数	模型 2 系数	模型 3 系数	模型 4 系数	模型 5 系数	模型 6 系数
家庭民族特征	父母一方或双方为汉族 (参照: 父母均为藏族)	146. 0***	128. 71***	114. 19***	166. 95***	143. 89***	134. 79***
性别	男 (参照: 女)		19. 60**	18. 35**		1. 41	2. 06
父亲教育年限			1. 35	1. 39		1. 97**	1. 74*
父亲职业	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1	1		1	1
	服务业或制造业普通员工		6. 48	5. 61		2. 29	3. 53
	个体户		3. 88	3. 25		11. 05	12. 15
	农牧业		-10. 90	-8. 27		-5. 75	-4. 87
	其他		-29. 23	-15. 29		-0. 28	1. 26
家庭所在地	区内农牧区		1	1		1	1
	区内城镇		-12. 48	-15. 29		2. 46	3. 74
	区外农村		18. 39	15. 71		17. 56**	16. 69**
	区外城镇		20. 76	18. 73		23. 18*	21. 72*
大学班级民族构成	以藏族为主的班级 (参照: 汉族和藏族混班)			-28. 57***			-25. 41***
截距项		454. 6***	441. 39***	443. 28***	456. 87***	419. 91***	423. 13***
Adj R-squared		0. 52	0. 53	0. 54	0. 62	0. 63	0. 64

注: \* p<0.05; \*\* p<0.01; \*\*\* p<0.001。

西方的文化差异理论对于少数民族学业成就低于主流族群的一个解释是: 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在教育过程中得不到充分重视, 使得携带这一文化的群体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他们在学习主流群体语言和现代学校教育科目知识时必然付出额外的努力, 这无疑影响了考试成绩。对于藏族学生来说, 有研究发现,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 藏文是四大科目之一, 但随着年级的增加, 藏文的课时数在减少。而汉语则随着年级的增加, 成为学校教育系统主要课程的通用语言。此外, 在其他科目的教材内容之中, 整体社会的生活与文化内容逐渐增多, 而有关藏族的生产和生活内容不断减少<sup>1</sup>。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现代教育系统与藏族传统生活与文化内容之间的疏离, 使得藏族学生的学习过程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语言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显性指标。本研究发现, 藏族学生的汉语言能力与高考分数之间有着显著关联。在加入反映学生汉语水平的“大学班级民族构成”变量后, 在模型 2 和模型 5 的整体解释力分别较模型 1 和模型 4 提升了 1 个百分点, 而家庭民族身份变量的影响系数有少许下降。汉语水平对学生高考成绩影响十分显著, 在文科生中, 以藏族为主班级的学生高考分数比汉藏混班的学生低 28.6 分, 理科考生的上述两个群体相差 27.7 分。

在这里, 我们可以借鉴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来进一步分析。伯恩斯坦指出, 不同社会阶

<sup>1</sup> 朱志勇:《西藏牧区小学教育调查—那曲地区达萨乡小学个案分析》, 转引自马戎、郭志刚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年, 第 277-333 页。





层在家庭中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劳工阶层通常多使用“限制型符码”，中产阶级多使用“精致型符码”，而学校教育主要传递以“精致型符码”为主的知识，由此，中产阶级子弟更容易适应学校环境，进而更有可能在教育竞争中获胜。尽管伯恩斯坦侧重的是阶级分析，说明劳动民众日常用语（如中国的民间口语）与知识阶层用语（如文言文）在词汇、语法和习惯上存在差异，相关差异影响了来自不同阶层学生的学习，并不直接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异，但是该理论指出了家庭语言与学校语言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一点非常重要，可用来理解本研究发现藏族学生的学业发展劣势。对于家庭语言为非汉语的藏族学生来说，以汉语为主要媒介和以汉语书面写作能力为基准的学校教育环境很大程度上使其在教育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对于西藏近些年来推行双语教育的相关研究发现，基础教育阶段汉语教学质量不高，其中汉语师资的缺乏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sup>1</sup>。与此同时，从目前西藏的双语教育实践来看，学校教育层级越高，汉语水平对于学科知识的吸收和消化就越重要（尤其是数理化）。西藏 95% 的小学目前主要采用藏语授课，从一年级开始开设一门汉语课。在初中阶段，约有 13% 的藏族学生仍为藏语授课模式，即除汉语文课以外，其余课程藏语授课。而在高中阶段，只有 5.7% 的藏族学生属于藏语授课模式，大多数学校采用的是汉语授课模式<sup>2</sup>。不难看出，对高中阶段的学习内容来说，学生的汉语水平直接影响到其对具体学科知识（如数理化）的吸收。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藏族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中的劣势，进而影响了他们的高考成绩。

除了语言因素之外，隐性的文化差异，比如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于教育意义赋予的不同，有可能也是藏族学生学业成绩较低的另一个解释路径。汉族传统上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群体，长达 1300 年的科举制度形塑了每一个家庭“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并激励着家庭为子女的教育大量投入。相比而言，藏族则没有如此强大的教育传统。藏族传统上“学在寺院”，有“舍寺院之外无学校，舍宗教外无教育”的说法，寺院教育几乎是唯一的教育途径<sup>3</sup>，而且是少数人的特权。寺院教育以宗教经典为核心内容。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代教育在西藏的发展以及藏族对现代教育的认同。一直到 1950 年代初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拉萨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小学，1959 年后现代学校教育才在西藏地区得以大范围推广。

近些年在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投入和动员下，虽然许多藏族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视学校教育，但他们对现代教育的认同主要来源于其工具性作用，比如接受学校教育后能够提高生活质量、改变现有的生活状况，考上大学后可以当政府公务员等。但在教学过程中，藏族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学校教育的所传递的知识在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以现代化城市生活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系统（特别是教材内容）与农牧民日常生活严重脱节，许多由汉文课本直接译成藏文的历史、地理、政治等教材与藏区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严重脱节，统一的标准化的义务教育模式忽略了藏区文化传统的本土知识经验。这种知识的脱节使得藏族学生在学业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容易落空，反过来又有可能抑制家长支持和投入子女教育的意愿<sup>4</sup>。此外，随着西藏大学生就业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需要面向市场来自主择业，大学生就业难也可能进一步抑制藏族父母及其子女对于教育价值的认同，进而影响其就学行为<sup>5</sup>。

此外，汉藏学生高考成绩的差异有可能还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优惠政策的“非预

<sup>1</sup> 马戎，《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中国藏学》2011 年第 2 期。

<sup>2</sup> 马戎，《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中国藏学》2011 年第 2 期。

<sup>3</sup> 吴德刚：《西藏教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年，第 69 页。

<sup>4</sup> 朱志勇：《西藏牧区‘三包’政策下的基础教育反思：达萨乡中心小学个案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 年第 4 期；Postiglione G, Jiao B. & Gyatso S. “Household perspectives on school attendance in rural Tibet”, *Education Review*, 2006, Vol .58 (3): 317-337.

<sup>5</sup> 朱志勇：《西藏牧区‘三包’政策下的基础教育反思：达萨乡中心小学个案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 年第 4 期。



期后果”有关。以 2017 年重点本科分数线为例，文史类汉族学生的分数线为 441 分，相应少数民族为 353 分，二者相差 88 分；理工类汉族学生重点本科分数线为 426 分，相应少数民族为 296 分，二者相差 130 分<sup>1</sup>。然而，这一优惠政策有可能会给藏族学生带来负向激励，使得其他后续在校中小学生认为只要投入较少的学习时间，就可能通过高考加分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比如，一项基于蒙古族学校的人类学研究发现，在蒙古族学生中存在这一负向激励机制。国家一系列降分录取政策使得蒙古族学生在中考和高考中升学相对较为容易。然而，学业成绩不佳高度影响了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就业状况差。高考加分政策在社会上形成了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的负面“刻板印象”，对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带来普遍的负面影响，这对那些成绩优秀、高考种不需要加分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也是十分不公平的。升学容易而就业差，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蒙古族学生在汉语教学学校的学习动力，强化其对于本族文化和语言的认同，他们往往选择消极对待学业，甚至用一些轻微的越轨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消极反抗，这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在校表现和学业成就。<sup>2</sup>当然，藏族学生中是否存在或在什么程度上存在类似机制，需要开展进一步调查研究。

#### 四、结论、建议及不足

本研究以西藏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 2017 年对西藏自治区下属 4 所大学在校应届毕业生问卷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分类别地系统考察了藏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高考分数差距。研究发现，藏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存在显著差异。与现有以多个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与汉族进行对比研究所得到的发现不同，本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地理区域并不是造成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高考分数差异的最核心因素，学生家庭的民族特征才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家庭民族特征即其与本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可能会通过显性和隐性等多种路径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由于许多考试科目内容是现代文科知识，目前这些科目的藏文教材和师资的质量明显不如汉文教材，因此，掌握汉语文的能力是家庭民族特征（及其文化差异）影响学生高考成绩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而基础教育中汉语师资的缺乏影响了藏族学生的汉语学习和汉语能力。

基于以上发现与初步的结论，本研究认为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提升藏族学生的学业成就，第一，大力提升西藏地区基础教育阶段汉语师资的质量，是提升藏族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汉语水平与能力的关键。事实上，从目前的大学生就业状况来看，汉语能力的提升也势在必行。汉语作为一门通用语言，是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通用性人力资本。汉语能力和使用汉语掌握专业知识的能力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和发展的瓶颈<sup>3</sup>。在本研究对西藏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中也发现，40.2%的藏族学生认为自身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语言能力。这从一个侧面也进一步证实目前藏族地区汉语教学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第二，在学校教育中增强藏族传统文化的地位也有助于提升藏族学生的基础教育质量。其一，努力提高各科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等）藏文教材的质量和师资培训，在教材中增加与藏区本地社会、经济、文化相关的内容和案例，这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成绩。其二，增强藏族地区学校教育课程的文化适切性，以此来增强藏族学生及家长对于现代教育的认同。

<sup>1</sup>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生高考优惠政策幅度大致相似，2018 年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汉文试卷 467 分，民语试卷 327 分（数学最低分 35 分）；文科一本汉文试卷 500 分，民语试卷 418 分（数学最低分 31 分）  
[http://www.orz520.com/a/education/2018/0630/14621282.html?from=haosou\\_news](http://www.orz520.com/a/education/2018/0630/14621282.html?from=haosou_news)

<sup>2</sup> 马文婷、袁同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低学业成就与学生反学校文化关系研究——以青海省乌兰县蒙古族学校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6 年第 2 期。

<sup>3</sup> 马戎，《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 年第 3 期。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西藏在校四年级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和样本来研究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大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已经属于同龄人中的优秀精英群体。以这一精英群体为样本来研究藏族和汉族同龄群体的学业成就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无法直接反映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各族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第二，本研究仅从语言的角度考察了家庭的民族特征的差异与其学业成就之间的关联。实际上，民族特征是一个比语言更为宽泛的领域，包括显性和隐性等多个方面的文化特征，这是本研究的一个缺憾。第三，对于学生汉语言能力的测量还需进一步精确，具体而言，除了考试成绩外，如何测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就业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还需要在今后的实地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与改进。第四，由于本次调查问卷的篇幅所限，在我们的问卷中很少问及家庭成员如父母和其他长辈对于子女教育的理念问题，比如父母对子女在教育发展方面的具体期待与投入等等，因此，对民族特征和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路径和机制解释主要借鉴相关文献提供的观点和分析逻辑（的洞见），需要通过今后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另外，如何在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水平的同时持续提高各级学校的母语文课程教学水平，努力培养高水平的双语人才，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同样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关注的重要任务。与少数民族的基础教育、高考表现和毕业后就业状况有关的研究专题很多，这些专题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一个多民族国家当中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融入国家现代化演进的程度，也都是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需要长期加以关注的重大研究专题。

## 【论 文】

### 欧洲文献中的土伯特：以十三至十八世纪为重点<sup>1</sup>

陈 波<sup>2</sup>

**内容提要：**本文以十三至十八世纪欧洲有关土伯特（Tibet）的文献为重点，研究涉及土伯特的主要符号及其所指之间的关系。蒙元时代有三个关于土伯特的直接知识传统，在现代早期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把土伯特归属鞑靼范畴，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学界才开始将土伯特转属知纳（China）；1580年代以后欧洲传教士从实地发回报道，提供有关符号及其所指的新知，包括现在普遍接受的拼写形式Tibet和藏文化中的地理分类系统；深入的当地知识和欧洲认知框架之间的不一致关系导致欧洲东方学中出现二重土伯特观，跟二重知纳观交织，并与之一道成为其表达的内在机制、困境和缩影。

**关键词：**Tibet/土伯特；China/知纳；鞑靼；二重土伯特；二重知纳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大军西征，引起欧洲的震动<sup>3</sup>；其后果之一便是若干使者前往东方。他们的见闻有涉及土伯特的地方，成为欧洲最早关于这一区域的知识，其影响长达三四个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尤其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有涉足藏区的，始有关于这一区域的新知识陆续出现于欧洲知识界。这些不同时代关于藏区的知识是如何协调、整合的？它们如何反映东方不同区域

<sup>1</sup> 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第162-176页。

<sup>2</sup> 作者是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教授。

<sup>3</sup> 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in *Studia Tibetica*, ed. Helga Uebach and Jampa L. Panglung. Munich, 1988.

